

# 論文學倫理學批評和文以載道

刘海萌\*

## 目 录

- 一、引言
- 二、“文以載道”：中國古代文論的核心
- 三、文學倫理學批評：“文以載道”的提出
- 四、兩者的聯系和區別
- 五、結語

## 一、引言

“文以載道”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核心觀點，其內涵是以文藝作為政治教化的工具，憑借文藝的引導人情使之符合道德的作用，給道德賦予政治功用，在文藝作品中反映儒家以“德治”、“民本”為重心的政治倫理之道，通過學習思考等方法提高道德境界的修養之道，以及體現事物內在特點與規律的自然之道。文學倫理學批評是從倫理的立場解讀、分析和闡釋文學作品，研究作家以及與文學有關問題的研究方法，認為文學是特定歷史階段倫理觀念和道德生活的獨特表達形式，文學在本質上是倫理的藝術。同時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對“文以載道”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從繼承的角度來說，是對古代文論“文以載道”的引導、教化、倫理道德指向作用的認同。從發展的角度來說，文學倫理學批評是中國學者聶珍釗先生在自身豐富的中國文學理論知識的基礎上，進行英美文學文本分析中得出的，是中西方文學理論的壹種新的結合體，是壹種新的、放之四海

\* 건국대학교 영어중문학과 한중비교어문학 박사 수료생.

而皆準的文學批評準則。同時也擴大了對於“道”的闡釋，“道”不僅僅包括為統治者利益服務的道德，也不僅僅是“士人”為官的準則，而更加強調的是個人自身的壹種頓悟，這種頓悟標誌著個人或者人類發展進入到壹個嶄新的階段。

## 二、“文以載道”：中國古代文論的核心

“文以載道”是古代文論的核心觀點，其內涵是以文藝作為政治教化的工具，憑借文藝的引導作用使人符合道德的要求，並給道德賦予政治功用，在文藝作品中反映儒家以“德治”、“民本”<sup>1)</sup>為重心的政治倫理之道，通過學習思考、積善成德、省察克治、慎獨等方法提高道德境界的修養之道，以及體現事物內在特點與規律的自然之道。文藝求美，倫理向善，“文以載道”觀體現了古人中國人美善統壹的哲學理念。

“文以載道”出自宋理學家周敦頤《通書·文辭》：“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sup>2)</sup>文以載道是關於文學社會作用的觀點。其實“文以載道”的思想，早在戰國時《荀子》中已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sup>3)</sup>。後來唐代文學家韓愈又提出的“文以貫道”之說，他的門人李漢在《昌黎先生序》中說：“文者，貫道之器也。”<sup>4)</sup>。由中唐時期韓愈等古文運動家提出的“文以貫道”<sup>5)</sup>發展，經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的解釋得到完善。“文以載道”的意思是說“文”像車，“道”像車上所載之貨物，通過車的運載，可以達到目的地。文學也就是傳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這裏所說的“道”，是指儒家的傳統倫理道德。周敦頤認為，寫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揚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倫理綱常，為封建統治的政治教化服務；評

1) 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第127頁。

2) 周敦頤著：《周子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27頁。

3) 荀子著：《荀子正名》，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38頁。

4) 韓愈著：《昌黎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83頁。

5) 李長之著：《韓愈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第114頁。

價文章好壞的首要標準是其內容的賢與不賢，如果僅僅是文辭漂亮，卻沒有道德內容，這樣的文章是不會廣為流傳的。

古人的“文以明道”、“文以貫道”，實即就是現在我們說的“文以載道”。文以載道的“道”，究竟是什麼？其實從荀子的“文以明道”到“文以載道”，“道”的內涵與外延都因時或人而改變的。在本文中“道”的釋意，不是道路，也不是老子《道德經》裏的“道可道，非常道”<sup>6)</sup>那種玄而又玄的“道”，而是道德、道義、正義、倫理的意思。換成現代人的說法，就是人類良心，社會責任感。中國古代文學家提倡詩教，企圖以文學作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文”是手段，“道”是目的，“文”都是為其“道”服務的。這種傳統被表述為“文以載道”或者是“文以貫道”，不但成為歷史散文的共同準則，而且成為整個古代文學的基本精神。

“文以載道”是儒家正統的文藝觀，反映了“士”建樹社會功業的生命價值觀，他們積極的入世情懷與建功立業的抱負促成了它的形成。此外，中國傳統哲學的經世致用的價值理念讓儒者給文藝賦予了更豐富的政治教化功用，如美刺作用、傳承古哲聖賢之道的作用等。因此，美善統壹理念、“士”的建功立業的價值理念和經世致用理念促成了它的形成。並且，“文以載道”觀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忠君愛國”與“孝”兩種主要的倫理訴求，這是文藝對道德的反映，也是適應傳統社會宗法制度的需要的道德綱常的需要。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懷以倫理、政治作軸心，突出的表現為經世致用，為國分憂。春秋戰國時期舊秩序崩潰，新秩序誕生，士被社會變革推上了時代的大舞臺，並從此與官結緣，以治國平天下為人生價值的最高實現，由士而仕、投身宦海成為其規範的自我角色認同，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逐漸成為古代士人最初的心態。如李白是位愛憎分明、豪邁不羈的偉大詩人。他壹直關心國家的安危、興衰，很想“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sup>7)</sup>，但卻始終到處碰壁，坎坷壹生。年過花甲仍不改想為國效力的初衷，但因體力不支，將忠骨留在了安徽的當塗縣。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稱：“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

6) 李耳著：《道德經》，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183頁。

7) 李白著：《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436頁。

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sup>8)</sup>這也表達了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積極用世、憂國憂民的典型心態。以後將這種精神推而廣之的，由顧炎武提倡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sup>9)</sup>，這就把關心國家命運前途的責任，加到了每壹個普通百姓的身上，增加了民主意識的成分。在關係到民族興旺的時刻，這兩句話有著強大的政治號召力。

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懷決定了他們始終以天下為己任，念念不忘拯世濟民。在古代士人的潛意識裏，國家是家的放大，而君與國家是壹致的。我們說中國古代偉大詩人的時候，無論他處在社會的哪壹個階層，有壹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就是看他是不是關心社會，關心人民，關心國家，關心天下事，如果要是他沒有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他可以是壹位優秀的詩人，但是他不是偉大的詩人。帝王將相者如像劉邦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sup>10)</sup>，如曹操的《短歌行》，“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脯，天下歸心”<sup>11)</sup>，他們所表現的是帝王的壹種胸懷。那麼對於普通的士大夫呢，是不是也有同樣的情懷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們同樣也有這樣的情懷，他們也用詩歌表現他們，自己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比如辛棄疾在他的，《破陣子·醉裏挑燈看劍》裏邊寫道，“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sup>12)</sup>，這樣壹種思想，不是壹位兩位詩人的思想，而是中國古代所有的重要詩人的共同的思想，從屈原開始到曹操，到曹植，到李白，到杜甫，到白居易，到陸遊，到辛棄疾，他們都是積極入世，關懷民族、國家、天下的，他們寫出了很多表現拯世濟民之誌的詩歌。

8) 諸葛憶兵著：《範仲淹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83頁。

9) 顧炎武著：《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62頁。

10) 司馬遷著：《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239頁。

11) 曹操著：《曹操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524頁。

12) 辛棄疾著：《辛棄疾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67頁。

### 三、“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提出

“文學倫理學批評”是中國學者聶珍釗先生於2004年創立的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在中國壹定程度上被應用於文學研究，2012年，國際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會正式成立，標誌其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壹定程度的影響<sup>13)</sup>。

“文學倫理學批評”(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是壹種從倫理視角尋找構成文學文本及文學意義的倫理因素並借助這些因素以解讀、分析和闡釋文學的批評方法，其目的在於通過對文學的批評從中獲取道德教誨。它從起源上把文學看成人類倫理的產物，認為文學是特定歷史階段社會倫理的表達方式，文學在本質上是關於倫理的藝術。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人類為了倫理的表達需要創造了文字，然後借助文字記載生活事件和人類自己對倫理的理解，將文字組成了文本，於是最初的文學就這樣產生了<sup>14)</sup>。從歷史文獻的意義上說，古老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和悲劇，最早記述了人類倫理關係和道德規範中的豐富活動，因而文學是人類的道德教科書。即使人類的社會制度逐漸完善以及成文法出現以後，文學仍然是社會制度、道德規範和法律規範的文學表現形式。因此，文學的倫理價值和教誨功能是從文學產生之初就有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是壹種闡釋批評，它以文學文本為主要批評對象，從倫理的視角解釋文本中描寫的不同生活現象，在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的復雜倫理關係中，對處於特定歷史環境中不同的倫理選擇範例進行解剖，分析倫理選擇的不同動機，剖析倫理選擇的過程，揭示不同選擇給讀者帶來的道德啟示。文學倫理批評構建自己的基礎理論和話語體系，運用自己的學術話語解讀文學文本，分析各類文學人物的倫理選擇，幫助讀者正確理解文學作品，為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指引，為人類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經驗，並從中獲取道德教誨。

13) 聶珍釗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25頁。

14) 與壹般意義上的“人類創造文字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存單純的記憶，為了生活上的方便。”有所不同。

文學物質論目前的觀點認為，文學是“壹種意識形態”或“審美意識形態”，是“審美的語言作品”<sup>15)</sup>。這個觀點在中國大陸被看成是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基本命題。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由於文學是以文本為載體的，因此文學的形態是壹種物質形態而不是意識形態。

#### 四、“文以載道”和“文學倫理學批評”

##### 1. 傳承

###### 1.1 文藝的引導

文學藝術對社會發展有著引導的作用，對於這壹點，中國古代從孔子開始就有所論證：“興觀群怨”，來自孔子對詩社會作用的高度概括，是對詩的美學作用和社會教育作用的深刻認識，開創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源頭。出自《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所謂“興”，就是“引譬連類”<sup>16)</sup>，並可用以“感發誌意”<sup>17)</sup>；所謂“觀”，就是“觀風俗之盛衰”，旁人可以從中“考見得失”；所謂“群”，就是“群居相切磋”；所謂“怨”，就是“怨刺上政”<sup>18)</sup>。孔子把詩歌作為從政和教育的工具，通過對作品的鈎研，考察詩歌的政治作用，看到了文學的社會價值，但他隨後有把文學的作用歸結到了“事父、事君”上去，則又表現出了利用文藝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用心<sup>19)</sup>。

15) 冯宪光：〈论文学的审美语言形式〉，《福建论坛》，(06)，2008。

16) 孔安國著：《十三經註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245頁。

17) 朱熹著：《四書章句集註》，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437頁。

18) 鄭玄著：《周禮註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879頁。

19) 周勛初著：《中國文學批評小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第64頁。

“文以載道”對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懷的影響集中的表現在其人生理想上。他們的人生理想就是依照壹個既定的傳統模式來規劃自己的壹生，沿著由聖人設定的“修、齊、治、平”<sup>20)</sup>的人生道路走下去。他們關注社會、政治與民眾，“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通過“立心”、“立命”，繼承“中絕”已久的聖人之學，“為萬世開太平”，目的都在於檢驗自身的道德修為。歷史上，每當中華文化出現斷裂時，作為文化傳承者的士人便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精神是推動中華民族向前發展的動力。而這種憂患意識也逐漸成了士人高尚人格的標誌，成為古代士人激賞贊嘆的對象。如唐代的詩人非常重要的有李白和杜甫，詩仙和詩聖對於我們來說，都是值得我們敬重的，但是在長久的中國封建時代，研究杜甫喜愛杜甫的人非常多，這其中有壹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把杜甫看成壹位詩聖，看成詩壇上的聖人。在封建時代，杜甫的地位非常高，對杜甫的評價，認為杜甫最主要的是忠君，蘇東坡說杜甫是，每飯不忘君的，而到了建國以後，我們對杜甫的評價依然很高，這個時候，我們說杜甫是壹位人民詩人，表面上看起來，他既忠於皇帝又熱愛人民似乎是對立的，但實際上在杜甫這兒是統壹的，因為杜甫有壹顆仁者的心，他用仁者的心來看待社會，來看待自然，他對所有的人，都是懷著壹顆仁者的心去看待的。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懷往往表現出對民生、民眾的關注和熱心，這歸根到底還是為國分憂，為忠君服務。極度崇拜以君、父為表征的社會政治權威，尊崇以孔子為宗師的知識傳統及其內蘊的價值觀念，認可倫理道德的絕對價值，熱衷於介入政治體制等等，這是古代士人精神的精煉總結，也是古代士人入世情懷的精準概括。在封建時代，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推翻了壹個又壹個封建王朝，終於迫使封建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懂得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認識了君和民之間既對立又統壹的關係，憂國同憂民是不可分的。所以，壹心想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寫下了“三吏”、“三別”<sup>21)</sup>的著名詩篇，以反映農民的疾苦。心懷

20) 孔子著：《禮記·大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71頁。

21) (唐)杜甫著：《杜工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第31頁

“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的創作思想的白居易，寫“新樂府”也是為了把老百姓的痛苦反映給最高統治者，希望政治上得到改善，減輕人民的痛苦，以利國家的安定。柳宗元寫下《捕蛇者說》也是為了“以俟觀人風者得之”<sup>22)</sup>。古代士人的入世情懷往往在個人身處不得誌的遭遇時，仍表現出以天下蒼生為念的博大胸懷。中國幾千年積澱的文明史就是壹部古代士人在“遇”與“不遇”、“仕”與“不仕”、“達”與“不達”兩種路徑間徘徊、統合、分離的歷史。家國情懷似乎是中國士人的壹種根性。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以致在古代中國有隱逸情懷的士人不少，但真正的隱士卻不多。當然古代士人也有因避亂世而隱居的，如諸葛亮之高臥隆中，躬耕為樂，但他終於經不起劉玄德三顧茅廬的誠意，以天下蒼生為念，最後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品格，成為“經世致用”的典範<sup>23)</sup>。在小說《三國演義》中，經過形象的、神話的渲染，更使他放射出異樣的光彩，成為千古傳頌的賢相。

文學通過壹系列道德事例和榜樣從正面實現教誨、獎勵和懲戒的目的，從而幫助人完成擇善棄惡而做壹個有道德的人的倫理選擇過程。因此，道德教誨是文學的基本功能。審美只是文學欣賞和文學批評的方法。目前壹種影響廣泛的觀點認為，文學基本功能是非功利性審美：“文學是審美的藝術”，“文學的本質是審美”，“文學的壹功能就是審美”，文學的本質就在於審美。文字的出現時從自然選擇進入倫理選擇的標誌。人類創造文字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把自己的道德經驗保存下來並與他人分享，形成生活規範。文字產生以後，口耳相傳的道德經驗變成了由文字固定下來的文本形式，例如詩歌、故事、格言、寓言、小說、戲劇等<sup>24)</sup>。這些由文字構成的文本，都是對人類如何進行倫理選擇的描述和評價。

22) 柳宗元著：《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10頁。

23) 賴力行著：《中國古代文論史》，長沙：嶽麓書社，2000，第11頁。

24) 原始佛教的佛徒把釋迦牟尼生前的‘頓悟經驗’，採取‘結集(群體背誦)’的方式保存下去，並無用文字紀錄下來。(當時已有文字存在)他們認為：‘神聖的經驗’應該由聲音保存下去並與他人分享，形成生活規範，不可由文字固定下去。因此，釋迦牟尼的頓悟經驗變成佛經(由文字固定下來的文本形式)，還要等待500多年的時間。原始基督教的情況也是一樣，耶穌的生前死後時的原始基督教徒，盡管當時已有文字存在，並沒有把耶穌的頓悟經驗由文字固定下來，他們開始由文字記錄下去是300年以後的事情。可見古人對文字功能的認識。

## 1.2 教化作用——“開卷有益”

這個成語來源於《澠水燕談錄》：宋太宗日閱《禦覽》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補之。嘗曰：“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sup>25)</sup>教誨是文學的本質屬性，審美是為文學教誨功能服務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是從本質上闡釋文學的倫理特性，從倫理的視角解釋文學中描寫的不同生活現象及其存在的道德原因，並對其作出價值判斷。“文以載道”觀體現古代士人以德為先的修養觀，反映他們看重文藝作品的思想性，並且關注文風與社會風氣的相互關係，這些合理內容對於應對當前文學領域出現的“文不載道”及“文載邪道”的商業化、時尚化與庸俗化的危機有著積極的導向意義。現代文學應傳遞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核心價值觀念，高揚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抵制低俗，無論是創作者、批評家、大眾媒體還是公眾輿論都應當履行純正文風的職責，社會各方面也應努力實踐黨中央倡導的培育良好社會道德風尚的舉措，使文風與社會風氣相互促進。這就是“文以載道”觀的現代啟示。

文學倫理學批評表達論壹些觀點認為：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文學是主體審美意識的語符化顯現；文學是顯現在語言中的審美意識形態。文學倫理學批評從起源上把文學看成人類倫理的產物，認為文學是特定歷史階段社會倫理的表達形式，文學在本質上是關於倫理的藝術。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人類為了倫理的表達需要創造了文字，然後借助文字記載生活事件和人類自己對倫理的理解，將文字組成了文本，於是最初的文學就這樣產生了。文學是人類的道德教科書，文學的倫理性質和教誨功能是從文學產生之初就有的<sup>26)</sup>。文學的價值就在於倫理價值，即通過對處於特定歷史環境中不同的倫理選擇範例進行解剖，分析倫理選擇的不同動機，剖析倫理選擇的過程，揭示不同選擇給我們帶來的道德啟示，發現可供效仿的道德榜樣，為人類文明進步提供經驗和教誨。

25) 《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26) 聶珍釗著：〈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外國文學研究》，(2)，2006。

## 2. 彌補不足

### 2.1 中西方文論的結合

到了宋代，文學家們對於“文以載道”的強調達到了頂峰，他們大多都是要求以“道”作為“文”的內容，但是他們各自對“道”的內涵的理解以及對“文”“道”關係的處理上又各有不同。在蘇軾、歐陽修等人的文論中，“道”雖然是“文”的內容，但卻並沒有被緊緊束縛在儒家思想的傳統領域裏；而且他們“文”“道”兼重，提倡自然的文風，對於“文”的要求仍然很高。“文以明道”的說法被周敦頤發展為“文以載道”——他的《周子通書·文辭》中所說的“道”，是指儒家的傳統倫理道德，寫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揚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倫理綱常，為封建統治的政治教化服務；評價文章好壞的首要標準是其內容的賢與不賢，如果僅僅是文辭漂亮，卻沒有道德內容，這樣的文章是不會廣為流傳的。在他看來，“道”專指道德，“文”專指文辭，實際就是要求文辭為道德服務，而且他所言之“道”也限定於“聖人之道”。

明末清初乃至民國初年以來，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充滿著中西方文化和思維方式的激烈碰撞。新時期以來，中國的文學理論面臨著西方文論和文學作品源源不斷的強烈沖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文學界從作家到作品再到文學理論，都處於西方文學思潮的深刻影響之下<sup>27)</sup>。在自身發展狹隘化和西方文論傳入對其沖擊的雙重影響下，“文以載道”頻頻遭到批判。

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文化中的“文學”概念的採用，這種概念重視的是作品的審美性和娛樂性，強調“通俗文學”；但中國文化中所說的“文學”有著移風易俗、端正教化，“補察時政，泄導人情”<sup>28)</sup>的作用，重視“典雅文學”。文學家以及研究文學的學者在接受西方“文學”觀念之後，都在強調“文學”的獨立性。事實

27) 郝奕著：〈何去何從——當“文以載道”遇到西方文論〉，《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11)，2014。

28) 聶珍釗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94頁。

上，當把文學與政治割裂開，而壹味宣泄個人情感和追求娛樂的時候，不是文學本位的回歸，不是文學地位的提高，而是文學地位的降低。

在“萬事”全球化的今天，交流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充分滲入，對中國文論來說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們不能回避去借鑒西方文論中對我們有利的部分，應充分利用其成就來幫助構建並豐富中國當代文論。西方文論就其認真嚴謹及理論性、系統性來說，對中國文論的意義是很大的。因為差異性往往包含著互補性，不同理論中互補性的東西若是被發現，也能建構起新的理論形態，產生飛躍性思維成果。西方文論對事物本來面貌的重視、對生活本質的重視以及對自然的敬畏和積極對抗，對中國文論也是壹個很重要的啟示。將中國古代文論進行現代化闡釋，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經由現代眼光打量之後，發掘二者的相通之處，以期實現平等的對話和交流。在言意關係這壹脈，“文以載道”觀也同樣需要結合中西方文論的現代化闡釋。這要求我們首先弄清楚“文”與“道”的內涵。“道”應是社會責任感和人類良心，而“文”則應是蘇軾所言的具有獨立價值的文學及文學藝術。

那麼這就對文學發展的環境提出了要求——文學需要自由。古往今來，文學家的歷史目的大致相同，都是為了用自己的話語建構來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繁榮興旺。他們通過文學來表達其對世界的認識和看法，以其藝術家獨有的敏感和人文關懷去發現現實生活中的美與醜、善與惡，去挖掘生活中存在的不足，從而探索更美好的生活。“文以載道”也同樣對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生產者提出了要求——文學家要有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由於文人是社會成員中掌握科學文化知識較多、思想意識較強的群體，所以也就相應地承擔著更大的社會責任。在當代中國，文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壹部分，這就決定了他們同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有著共同的政治立場、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文人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他們在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和人民幸福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積極的、健康的、穩定的力量<sup>29)</sup>。

29) 葛荃：〈論中國傳統“士人精神”的現代轉換〉，《華僑大學學報》，(2)，2001。

“文以載道”思想雖然代表著中國古代文論的核心思想，並且在中華文明五千年傳承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當代中國也還閃耀著它壹定的時代價值。但這壹理論在進行西方文本批評時略顯不足，尤其是在文學“共性”的分析中，國家文化的不同所引起的“道”的不同所帶來的定義上的混亂等等。而文學倫理批評恰恰可以彌補這壹不足。文學倫理學批評是中國學者聶珍釗先生在其多年從事外國文學尤其是英美文學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的文學理論研究成果，是結合中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成果的精華。

聶先生認為倫理選擇是人類的第二次選擇。而人類的第壹次選擇：自然選擇。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就是如何把人同獸區別開來以及在人與獸之間作出身份選擇。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隨著人類的進化而自然產生的。19世紀中葉達爾文創立的生物進化論學說，用自然選擇對整個生物界的發生、發展作出了科學解釋。我們從進化論的觀點考察人類，可以發現人類文明的出現是人類自我選擇的結果。自然選擇人類在進化過程中作出的第壹次選擇，然而這只是壹次生物性選擇。這次選擇的最大成功就在於人獲得了人的形式，即人的外形，如進化出來能夠直立行走的腿，能夠使用工具的手，科學排列的五官和四肢等，從而使人能夠從形式上同獸區別開來。但是，人類的第壹次生物性選擇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什麼是人的問題，即沒能從本質上把人同獸區別開來。正如達爾文自己所說：“自然選擇在文明的民族國家中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我只考慮了人從半人半獸的狀態向近代野蠻人的狀態進展的壹段情況”<sup>30</sup>。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通過進化和生存鬥爭解決了人是怎樣從猿進化而來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人同其他動物的本質區別的問題。

人類的第二次選擇：倫理選擇。人類的自然選擇，只是從物質形態上解決了人是如何產生的問題，並沒有清楚回答人為什麼是人的問題，即人與其他動物本質區別問題。因此人類在做出第壹次生物選擇之後，還經歷了第二次選擇：倫理選擇。人類的生物性選擇並沒有把人完全同其它動物與人相對的獸區別開來，只是到了人的倫理意識的產生，才真正把人同獸區別開來。倫理選擇

30) (英) 達爾文，謝蘊貞（譯）：《物種起源》，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98頁。

的目的是為了做壹個有理性的人。人在完成自然選擇之後，人和斯芬克斯壹樣，身上還同時存在著獸性因子和人性因子抑制獸性因子而做壹個有理性的人。獸性因子的表現形式為自然意誌或自由意誌，人性因子的表現形式為理性意誌或道德意誌。人的兩種意誌每時每刻都在彼此消長，互相轉化。人也始終在兩種意誌中進行選擇，選擇不同結構亦不同。從《聖經》的描述裏，我們可以得知人類的動物性選擇同倫理選擇有多麼不同。在上帝創造的伊甸園裏，最初出現的人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人。人同牲畜、昆蟲、野獸等生物盡管外形不同，但沒有智慧，無異於獸。人類同其他生物沒有本質的區別，這就意味著人類實際上並無可能實現上帝的意誌。只是人類最後選擇吃了伊甸園善惡樹上的果實，人類才有了智慧，因知道善惡才把自己同其他生物區別開來，變成真正的人。如果我們不從宗教的立場看待伊甸園的故事，而僅僅把它看成是有關人類文明起源的壹個寓言，我們就可以從中發現人類在文明進展中把自己同其他動物區別開來的能力。但是園子的中間長有壹棵分別善惡的智慧樹，那是上帝禁止他們採摘食用的，因為壹旦吃了那棵樹上的果子，人就有了智慧，人壹旦有了智慧，就可以分辨善惡了。夏娃渴望得到智慧就摘下智慧樹上的果實，有了智慧，才知道自己赤身露體，感到羞恥，於是就把無花果樹的葉子縫成裙子，為自己遮羞。知羞即為倫理。人們所說的亞當夏娃偷吃禁果的原罪，實際上是人類經過倫理選擇把自己從獸中解放出來而變成人後對人身上仍然存在獸性因子的理解。達爾文認為，人的知性是通過自然選擇獲得的<sup>31)</sup>。但是理性，是通過倫理選擇獲得的。從亞當和夏娃的倫理選擇中可以發現，他們同偷吃禁果之前的自己相比，其最大不同在於他們有了理性，因此他們具有了分辨善惡的能力。也正是由於他們能夠分別善惡，他們才從生物學意義上的人變成有倫理意識的人。因此，能夠分別善惡是辨別人是否具有理性的標準。理性是倫理意識的基礎，倫理意識具體表現為善惡觀念。善惡壹般不用來評價獸，而是用來評價人，是評價人的專有概念。因此，善惡是人類倫理的基礎。

而文學倫理學批評雖然是從西方文學研究中得出的，但同樣可以分析中國

31) (英) 達爾文 (著)，謝蘊貞 (譯)：《物種起源》，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88頁。

的文學作品。例如在《紅樓夢》分析中，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紅樓夢》是壹部描寫賈寶玉從“遊幻境指迷十二釵”到“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再到“大觀園試才題對額”，記錄了賈寶玉如何借助文學而在倫理選擇中成長的過程。空空道人為何抄錄石頭記，是因為“石兄下凡壹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角”，要將其流傳於世，以免有誤。空空道人最後說的話富有深意：“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sup>32)</sup>因此，文學作品需要文學批評才能發揮教誨的功能。再如《水滸傳》中的宋江、盧俊義等人在上梁山之前，都經歷了落草為寇還是為朝廷盡忠的倫理選擇。梁山泊壹眾好漢在決定投奔梁山之前或之後，幾乎都經歷過相似的倫理選擇。

## 2.2 從統治者意誌到個人的意誌

“文以載道”從荀子的“文以明道”開始直至隋唐的“文以貫道”以及當代“延安文藝座談會”。共同的觀點是認為寫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揚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倫理綱常，為封建統治的政治化服務。而文學倫理學批評則更為注重個人的頓悟。

文學倫理學中的“斯芬克斯因子”就是西方文學分析中的帶有人“個性”的因子。西方文學中的斯芬克斯形象和中國文學中的伏羲女媧，他們的人頭和獸身的形象說明，人是從獸進化而來的，人的身上還保留著獸的本性。我們把人和獸結合在壹起的這壹特點，稱為斯芬克斯因子。“斯芬克斯因子”<sup>33)</sup>由人性因子 (human factor) 與獸性因子 (animal factor) 兩部分構成，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級因子，獸性因子是低級因子，因此前者能夠控制後者，從而使人成為有倫理意識的人。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前提。斯芬克斯因子

32) (清)曹雪芹著：《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第324頁。

33) 斯芬克斯是希臘神話中壹個長著獅子軀幹、女人頭面的有翼怪獸。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懸崖上，向過路人出壹個謎語：“什麼東西早晨用四條腿走路，中午用兩條腿走路，晚上用三條腿走路？”如果路人猜錯，就被害死。俄狄浦斯猜中了謎底是人，斯芬克斯羞慚跳崖而死。斯芬克斯後來被比喻作謎壹樣的人和謎語。

的不同組合和變化，將導致文學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為特征和性格表現。形成不同的倫理沖突，表現出不同的道德教誨價值。獸性因子即人的動物性本能。動物性本能完全憑借本能選擇，原欲是動物進行選擇的動因。獸性因子是人在進化過程中的動物性本能的殘留，是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因素。獸性因子屬於人身上非人的壹部分，並不同於獸性。動物身上存在的獸性不受理性的控制，是純粹的獸性，也是獸區別於人的本質。而獸性因子則是人獨具的特征。獸性因子在人身上的存在，不僅說明人從獸進化而來，而且說明人即使脫離野蠻狀態之後變成了文明人，身上還存在有動物的特性。人性因子即倫理意識，主要是由人頭體現的。人頭是人類從野蠻時代向文明進化過程中進行生物選擇的結果。人頭出現的意義雖然首先是人體外形上的生物性改變，但更重要的意義是象征倫理意識的出現。人頭對斯芬克斯而言是他身上具有了人的特征，即人性因子。人性因子不同於人性。人性是人區別獸的本質特征，而人性因子指的是人類從野蠻（Savagery）向文明進化過程中出現的能夠導致自身進化為人的因素。正是人性因子的出現，人才會產生倫理意識，使人從獸變為人。倫理意識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分別善惡的能力，即如同伊甸園裏偷吃了禁果的亞當和夏娃那樣，能夠分辨善惡，不能分辨善惡，就不能成為真正的人。由於人頭體現的人性因子的出現，人才能借助最初的倫理意識分辨善惡，從而使人從獸中解放出來，倫理意義上的人才得以誕生。也就是說，就倫理而言，人的基本屬性恰恰是由能夠分辨善惡的倫理特性體現的。人同獸的區別，就在於人具有分辨善惡的能力，因為人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夠控制獸性因子，從而使人成為有理性的人。人同獸相比最為本質的特征是具有倫理意識，只有當人的倫理意識出現之後，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從這壹意義上說，人是壹種倫理的存在。顯然，斯芬克斯是人類在經過生物選擇之後給我們留下的壹個倫理命題，即做人還是做獸？因此，斯芬克斯之謎給人類提出的是壹個選擇問題，即人類在經過生物性選擇之後還需要再次作出的第二次選擇：倫理選擇。

而人類的第三次選擇：科學選擇。人類經過第二次倫理選擇之後，進入了科學的時代。人類同科學密不可分，科學滲透進入人的全部生活之中。因此，

科學正在極大地影響人類生活，正在不斷地改變人類，對於人類來說，也正在進行第三次選擇，即科學選擇。這是人類文明進化的邏輯。科學選擇主要指的是科學同人的融合以及對人的改造，並主要以人造人的形式體現出來。科學選擇最早是在瑪麗·雪萊的小說<sup>34)</sup>中得到充分描寫，在後來尤其是20世紀末期以來出現的科幻小說中，都突出地表現了科學選擇的主題。文學倫理學的基本術語有：“理性意志”、“非理性意志”、“自然意志”、“倫理身份”、“人性”、“人性因子”、“獸性因子”、“自然情感”、“倫理混亂”、“倫理禁忌”、“倫理兩難”等。其核心術語是倫理選擇，其他術語的運用都同倫理選擇相聯系。倫理選擇指與人的道德行為有關的選擇，因此人的選擇可能是善的選擇，他可能是惡的選擇，但無論是什麼性質的選擇，對人都具有教誨的價值。文學的任務主要在於描寫人是如何進行倫理選擇以他們的選擇給我們帶來的教誨。文學倫理學批評不僅從人的本質的立場理解倫理選擇，而且認為倫理選擇是文學作品的核心構成。文學作品中只要有人物存在，就必然面臨倫理選擇的問題。在文學作品中，只要是選擇，必然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選擇。只要是兩個及兩個以上的選擇，就必然增加選擇的複雜性和導致選擇結果的不同。因此，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實際上就是倫理選擇的分析，人物的性格、心理、精神的分析，也需要以倫理選擇的分析前提。倫理選擇同倫理環境、“倫理身份”、“自由意志”、“理性意志”、“情感意志”、“倫理兩難”等結合在壹起。這些學術概念，是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核心術語。

## 五、结束语

在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中，“文”與“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壹個命題。“道”就是文章所表現的中心思想或主題。“文”的優點就是文章的創作主題十分鮮

34) Frankenstein (英) 瑪麗·雪萊著：《弗蘭肯斯坦》，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第12頁。

明，成為後世評判文章好壞的標準之壹。“文以載道”的積極作用，首先是壹種融合了美與善的社會意識形態，文學之美是自然美和社會美的壹種反映，在文學作品中，“美”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壹種約定俗成，對美的向往與追求的同時，也激發了人們對假、醜、惡的厭惡和批評，形成文學作品的核心價值與對讀者的吸引。

其次，它激發了中國封建社會長期以來“士人”積極入世的態度。壹生都在積極探究積極的生命價值，這種生命價值超出了對個體生命本身性質的認知，提升為對人類的境遇和生存命運的重視，並且這種生命價值觀鼓舞著他們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義和永恒，力求達成生命的理想境界。他們主張教化治國，重視文藝的政治教化功能，而“文”所承載的“政治倫理之道”最能體現他們的深層價值追求，並且儒家的倫理之道推崇德治和仁政，重民心，反映的是“士”關注的範圍超越了個人理想與生命價值，進而關注到百姓命運和生存價值，是“士人”建功立業生命價值觀的體現，也“士”作為組建中華文明、積極向上的動力源泉。

最後，是中國古代價值觀的形成。以忠孝為基礎的儒家政治倫理之道，重視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人倫”觀念，強調德治，重視統治階層對民的教化，“以禮制欲”，對於維護封建秩序的穩定，起到壹定作用。同時，忠君愛國的要求，成為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之壹，它鼓舞了眾多仁人誌士為了捍衛民族尊嚴，挽救國家危亡，前仆後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文以載道”也存在著局限性，即太過於強調文學的功利性，雖然文學倫理學也強調文學的教化作用，但它強調“建立辯證科學的文學道德標準，並從倫理道德價值方面肯定優秀文學作品，促進人類文明進步”<sup>35)</sup>。因此，作家進行文學創作必須遵從有益於讀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從而使文學作品有益於整個人類發展。對於外國文學批評領域的不足。文學倫理學批評道德傳統產生的源頭——古代希臘的倫理學。最為傑出的代表則是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在西方文學批評史上，關於倫理批評之爭從未間斷，文學的倫理價值在文學和美學界

35) 聶珍釗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68頁。

遭到質疑。面對美學同倫理之爭，聶教授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文學產生的目的是傳達倫理道德，文學的功能就是教誨。審美是為教誨功能服務的，是文學教誨功能實現的方法和途徑。聶教授強調把文學的教誨作用看成文學的基本功能，從理論上為文學倫理學批評設立了自我立場。他認為產生爭論的壹個重要原因是西方“倫理批評沒有建立起壹個完整的系統的理論體系，尤其是缺少自己明確的方法論”<sup>36)</sup>，而這正是文學倫理學批評最為鮮明的特點之壹。文學倫理學批評並不是對西方倫理批評的照搬移植，而是借鑒創新。從統治者的利用和個人意識的缺失的角度來說。“文以載道”從荀子的“文以明道”開始直至隋唐的“文以貫道”以及當代的一些政治口號。共同的觀點是認為寫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揚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倫理綱常，為封建統治的政治化服務。而文學倫理學批評則更為注重個人的頓悟，尤其是其中對“斯芬克斯因子”以及對“理性”、“人性因子”等因素的強調。從統治者的意誌到個人的意誌，個人的價值被發現和認識，再加上理論批評範圍向全世界的擴張，這是文學倫理學繼承和創新“文以載道”之處。但是聶教授的文学伦理批评也存在着伦理至上主义的缺点，在客观性和历史性方面，仍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36) 聶珍釗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17頁。

## 參考文獻

- 諸葛憶兵：《範仲淹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8.
-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6.
- 敦頤：《周子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荀子：《荀子正名》，北京：中華書局，2011.3.
- 李長之：《韓愈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1.
- 李耳：《道德經》，北京：中華書局，2011.1.
- 黃開紅：《關於文學論理學批評—訪聶珍釗教授》，《學習與探索》，（5），2006.
-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在中國》，《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10.
- 聶珍釗：《外國文學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10.
- 聶珍釗：《英美文學的倫理學批評》，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外國文學研究》，（2），2006.
- 葛荃：〈論中國傳統“士人精神”的現代轉換〉，《華僑大學學報》，（2），2001.
- 孫家洲：黃樸明，《中國古代經典二十講》，吉林：長春出版社，2009.1.
- 朱貽庭：《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 賴力行：《中國古代文論史》，長沙：嶽麓書社，2000.
- 최기숙：〈17세기 장편소설 연구〉，서울:월인, 1999

Abstract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Writings are Conveying Truth

Liu, Haimeng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it is the main idea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Its meaning is reflected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Confucianism,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Confucian “rule of virtue”, “people-oriented” as the focus of political ethics. Its essence is pays attention to the human conscie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problem is that literature has become a tool for political service, the utility is too strong, ignoring its aesthetic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cholars Mr. Nie Zhenzhao, combine with Western literature theory, to create th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more applicabl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Key words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writings are conveying truth, political, personage

투 고 일 : 2016. 9. 10. / 심 사 일 : 2016. 9. 15. ~ 2016. 10.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6. 10. 16.
---